

負責任傳媒絕不應公然美化罪犯

銳評

方靖之

「35+顛覆政權案」日前判刑，45名被告當中的「首要分子」戴耀廷被判囚10年，其餘被告判刑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

「35+顛覆政權案」本質上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顛覆政權行動，通過癱瘓立法會以達到顛覆奪權目的，這樣的行為怎可能如一些被告所說是基本法所容許？法庭的判決表明被告已經干犯了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顛覆國家政權」罪，其行為是犯法，被告們都是戴罪之身，這是案件的核心事實。然而，一些媒體或因為自身的政治立場，或因為其他目的，對於「35+顛覆政權案」報道立場極為偏頗，故意營造悲情，將違法行為說成是「爭取民主」，把險惡用心的罪犯美化為「英雄」，這是嚴重違反傳媒操守和道德。

傳媒有立場不足為奇，但在報道上必須客觀中立，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需要緊守底線。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就是香港的

底線，犯法就是犯法，更何況是意圖顛覆政權，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安全的行為？負責任的傳媒怎能同情甚至視之作「英雄事跡」，對於煽動參與違法行為的罪犯，怎可能美化為「英雄」？這樣的傳媒操守何在、底線何在？

荒謬地營造罪犯「英雄人設」

法庭對於「35+顛覆政權案」的判決，獨立專業，沒有因為外部勢力的干預施壓而退讓，裁決專業公正合理，充分彰顯香港法庭的司法獨立。案件審理長逾一百天，其間控方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而辯方亦有充足的機會辯護。整個聆訊過程公開、透明、公正，法庭最終的判決亦具有堅實的法理依據，定罪與量刑理由充分，充分體現出普通法的原則，既有力維護了國家安全，亦捍衛了香港的法治精神，真正體現香港的司法優勢。

固然，對於判決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看法，但令人側目的是，在報道「35+顛

覆政權案」時一些媒體卻立場先行，陰陽怪氣，這體現在對於案中被告和行為的偏頗報道上，例如在報道判決時故意用上市民「冒雨旁聽」，淚眼婆娑以至呼天搶地的照片，彷彿案中的被告是受到莫大的冤情，但其實這些主要是「反對派」支持者，並非什麼普通市民。

在報道的行文之間，一些傳媒更故意製造悲情，誇大判刑，強調法庭拒絕接納有關罪行「不會實現」而減刑，意指法庭判罰並沒有理據。法庭判決是重判或輕判各有看法，但法官在判詞中亦已經清楚列出量刑依據，一切有根有據，一些傳媒在報道時故意製造所謂「重判」的觀感，顯然是有意挑撥，居心不良。

案中涉案共有47人，在16名不認罪被告中，經審訊後其中14人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連同早前已認罪的31人，案中共45人罪成；餘下兩人劉偉聰及李予信，基於定罪門檻而脫罪，律政司正就劉偉聰的裁決提出上訴。這說明涉案人士已

經被明確定罪，違反了香港國安法，其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是罪有應得，他們的身份是國安犯、顛覆犯。然而，一些傳媒卻因為立場原因，在報道中不但同情這些犯人，更將罪犯美化成「英雄」、「民主鬥士」，將他們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當成是「英雄事跡」，藉此否定法庭判決。這等如是對犯法行為、對罪犯的肯定和宣揚，嚴重違背了傳媒的操守和良知。

走《蘋果》老路害人害己

所有負責任的傳媒機構對於涉及公共秩序、恐怖活動以至犯罪事件的報道都有嚴格規範，關鍵是必須依法辦事，不能美化或宣揚任何犯罪行為，更不應對罪犯存有同情，甚至利用報道公器私用以表達自身的政治訴求。香港電台的《編輯政策及流程》亦明確提到：「在報道有關逃犯、疑犯及已被定罪的人，包括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人（例如利用媒體煽動他人干犯香港國安法下罪行的人），以及製作相關

節目時需小心謹慎。」這是傳媒人應有的表現，可惜一些媒體在處理「35+顛覆政權案」明顯缺乏這樣的操守。

早前網上短片《鳥籠》，就以一名傳媒新人的經歷，諷刺一些報章如《蘋果日報》，其所謂的「編採自主」，不過是「鳥籠自主」，是有政治前提的自主，由黎智英下指示設定《蘋果》基本立場，就像設下一個「鳥籠」，採編人員在「鳥籠」內有一定自由，但不可以跳出這個框架。而《蘋果》更成為一些人煽動「抗爭」暴亂，撕裂對立社會，對青年散播違法歪理的政治工具。

《蘋果》的操作就是不斷美化違法行為，不斷對罪犯歌功頌德，塑造成英雄，以此煽動更多青年參與其違法行為。雖然《蘋果》已經倒閉，黎智英也被捕了，但這些媒體歪風是否完全清除，也不見得。《蘋果》殷鑒不遠，其教訓值得社會各界警惕，特別是一些傳媒機構更不要走上《蘋果》的老路，最終害人害己。 資深評論員

期待新時代嶄新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議事論事

何志平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令台海局勢更為撲朔迷離。11月12至17日在珠海舉行的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殲-20、殲-35A等陸海空尖端武器裝備的亮相，以及解放軍於9月25日成功試射的12000飛行公里的東風-31AG洲際導彈，越發對台海各方形成了巨大震懾。專家們紛紛預言，台灣當局可能會審視自身策略，不敢觸碰紅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步伐加快。緊鄰台灣的香港，不少人擔心台海變動會對香港有重大衝擊，近日還有人議論香港回歸以來的「一國兩制」能不能對台灣作出良好垂範。

筆者認為，「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二十七年來成功施行，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類似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長期保持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更是未來一些國家化解地緣政治紛爭衝突以及和諧共存的最好參照和借鑒。「一國兩制」的偉大創舉和香港的實踐成就，本身亦是對世界和全人類的一大貢獻。「一國兩制」內容豐富，踐行辦法也變化無窮！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時至今天，尚在不斷的深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之中，領悟其中所蘊含的一切奧妙。就是香港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由1982年中英談判迄今）的政治過渡之後，需要加倍努力去發展一套基於「一國兩制」之上的香港論述，才能跳出固有模式和困囿之路。

「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

正如鄧小平所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一國兩制」目前用

在港澳，然而目的在台灣。香港回歸以來也在「一個國家」和基本法保障下，保持原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制度不變。香港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落實高度自治，港人的自由度只有增加並無減少，香港仍舊是國際大都市。

新時期，習近平主席更是從中華文明史的高度來看待香港以及「一國兩制」，不僅着眼於解決香港當下的政治疑慮，承諾「一國兩制」方針「必須長期堅持」，還從大歷史維度將「一國兩制」詮釋為一項長期國策。事實上，從新中國確立「保持不變、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以來，中央始終從戰略高度強調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即充分利用香港與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緊密聯繫，發揮其引進西方資金、技術、知識和經驗並輸出中國產品的「通道」作用。

香港今日作為自由港、單獨關稅區，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與世界頂尖國際金融中心之一、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成績顯赫的背後，與國家這項戰略密切相關。

然而，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處於深刻變化之中，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更加密切。此時，我們更要深刻認識香港本地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以及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須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勇於戰勝一切風險挑戰。「一國兩制」，不變的是「道」，是初心，是大原則；靈活變通的是辦法、政策，就是治理方式和手段要與時並進。在這滾滾歷史洪流中，不進則退，小進也是退！

香港最為遺憾的是，回歸後由於歷史慣性思維的影響，既沒有對先輩們在這片土地上開疆闢土的完整論述，也沒有對滋潤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中華文化文俗的有效傳承，更沒有對港英「殖民」史跡去蕪存菁的檢討與論述。以致回歸多年的香港，是一個未經歷「去殖民化」的社會。從「本土主義」到「國教風波」，從非法「佔中」、「旺角暴動」、「黑暴」，從「普選」概念爭論到「愛國者」概念界定等，其實都集中在政治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衝突和爭奪。

香港社會前些年出現的這些問題，也與其一脈相承、一成不變的「『殖民化』資本主義制度」有着重大關係。如政商精英主導的利益格局未受到觸動，高級公務員隊伍架構基本沒有改變，學校教材沒有更換等等。至今香港特區政府架構雖然幾乎每年都不斷有一些小變化，但也從未脫離過1973年港英時期《麥健時報告書》的框架。英國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歷史，給香港留下了一套「殖民」管治的經濟、政治和制度遺產。表面上看，那是恪守法制、規則和秩序，實質上則是一套文明價值系統。這樣，一方面造成政治架構上的互相牽制，導致施政困難；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公務員長期信奉「小政府大市場」模式，在新時代處理全新的經濟和政治、社會問題挑戰時，思維靈活有欠，缺乏有高度和格局的戰略能力；再加之西方社會和「反對派」不斷攪局和挑起事端爭議，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

這些因素盤根錯節，不是一朝一夕間形成，也沒有單一成因，而是綜合各方面原由積聚至一些難以化解的深層次矛盾，絕對不是今天一時三刻就能立馬解決的。當下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新形勢及新

一輪「全球化2.0」即將到來之際，自我覺醒，自我改革。鄧小平常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與政治制度無關。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只要能夠促進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都可以在實踐中使用。未來香港如何在「一國兩制」的得天獨厚優勢下自我改革、與時「求變」，並融會貫通，配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步伐，加快角色定位的調整，值得深思！

自我革命，「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

筆者不由想起去年初《求是》雜誌，一篇題為《全面從嚴治黨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的文章，內容中提及在毛主席領導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思考「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這個問題，並有初步答案。毛主席認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唯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其後，有關探索仍然持續，國家最高領導人在中共十八大以來給出了第二個答案，就是共產黨人須在接受人民監督的基礎上，進行自我革命，國家才能免於繼續經歷興衰循環的命運。

兩個答案前後相距六十多年，可見國家領導層一直非常重視並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黨和國家會將之視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筆者以為，這是一個認識並學習國家領導人重要思想的關鍵課題，同時對於思考「一國兩制」及香港未來出路和發展也將有着重大啟迪。

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使國家最高領導人始終篤行不殆，提倡不忘初心、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並不斷反省和及時自我糾錯。那麼香

港呢？我們永遠堅持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愛國愛港的初心從來不動搖；我們嚮往追求的是香港社會自我覺醒後的創新進步、各項制度的自我改革與提升，期待新時代一個嶄新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更要在這風雲變幻之際，從全球地緣格局出發，充分認識到香港處於國家邁向海洋邊疆地帶的地緣優勢，才能真正理解香港獨特的歷史進程及其在國家戰略中的獨特定位。在此意義上，「中國香港」和「一國兩制」這個概念不僅表明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把香港問題作為理解國家問題的「鑰匙」或「索引」，乃至於成為一種靈活處理歷史政治問題的「方法」。

如今，雖然過往香港取得了不少成就與讚譽，二十七年成功的「一國兩制」經驗，可為國土分裂或因地緣政治發生紛爭衝突的國家統一及和諧共存，提供最好的借鑒和垂範，比如韓國與朝鮮，或南塞浦路斯與北塞浦路斯；又或逼在目前的俄烏衝突，最可能的結局就是雙方停戰，劃分「三八線」，把烏克蘭一分为二：已經被俄羅斯控制的東邊土地就歸附俄羅斯，不加入北約；沒有被俄羅斯控制的西邊地方，可以成為中立緩衝區的新烏克蘭。不恰如「一國兩制」的東西烏克蘭嗎？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未來的香港，應該是站在祖國母親的肩膀上，目光放之四海，跳出腳下的一畝三分地，以「國之大者」的寬廣胸懷，融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完全優勢，從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可發揮「一國兩制」的最大威力，創造新的輝煌！

「特朗普2.0」對中國機遇大於挑戰



國際關係

宋魯鄭

特朗普以贏得所有七個搖擺州的驚人戰果強勢回歸，各國震驚意外之餘無不準備應對之道，評估可能的風險和機會，甚至韓國總統尹錫悅時隔八年之後不得不再拾起高爾夫球桿動練球技。至於從中國的角度，特朗普當選仍然是機遇大於挑戰。

首先，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到現在改變了美國二十一世紀以來的政治周期。即美國政策的連續性從過去八年縮短為四年。考慮到美國政治極端化的現實，每一次政黨輪替都是內政外交人事的大逆轉和大翻盤，國家頻繁的高強度南轅北轍的折騰。對外，嚴重損害了美國的信譽和可信度。對內，嚴重損害了其發展。過去，還可以認為美國的政策輪替是糾錯功能的一種體現，但現在雙方基本都對對方是全盤否定式的改變。以外交為例。民主黨執政就重視價值觀和盟友，並費盡心血和代價構建各種圍堵對手的聯盟。特朗普則將其完全廢除，退群毀約，上一任政府的經濟資源和信用投入完全打了水漂。這種四年就一

次的國家宏觀政策和方向的折騰對美國的損害是全方位的。

其次，今天的特朗普不管多麼受民眾支持，但客觀事實卻是他的第一個任期內，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差距在縮小。反倒是在拜登時期，中美差距重新在擴大。2017年特朗普執政第一年，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62%，2020年也就是特朗普執政最後一年，上升到68.9%。由於其政策後果的慣性，2021年拜登執政第一年仍然明顯上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75.5%，但到2023年回落至65%。

美在亞洲安保機制將名存實亡

現在特朗普回歸，重蹈覆轍的概率很大。僅就他公開的政策來看，對外加關稅、對內減稅、大規模驅逐移民、製造業回流，這都會推升物價。民主黨敗選的主要經濟原因就是高物價。根據美國農業部可查的最新數據，2018年無證農場的工人數量為41%。考慮到拜登執政四年大量非法移民湧入，這個比例更高。所以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的經濟後果是工人短缺，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美國移民委員會的數據則是14%的建築業將失去四分之一的工人。

第三，從大國博弈的角度，美國在歐洲和亞洲建立的針對中國的同盟體系都將會停擺，這些盟友還不得不轉向中國。特朗普奉行單邊主義，向來喜歡單打獨鬥，對盟友既不信任也拒絕合作，更把盟友當作榨取美國利益的對象。比如韓國現在承擔的美軍駐軍費用為10億美元，特朗普競選時聲稱要提高到100億美元。在貿易上對韓國也毫不手軟。但韓國是美日韓東亞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這樣的做法必然危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保障機制。像AUKUS、四方安全對話以及印太經濟框架（IPEF）都將名存實亡。

拜登之所以費盡心力搭建這樣的盟友體系，是因為他很清楚僅靠美國自己並不能實現遏制中國的目的。現在面對特朗普的單打獨鬥，中國自然是壓力減輕了很多。但這並不是中國收益的全部。因為這些盟友不得不和中國改善關係或者更加緊密的合作。比如在美國大選前夕，中印雙方就邊境地區的邊境巡邏達成協議，雙方的緊張關係開始緩和。

今年以來，中英關係、中澳關係的改善也進入了快车道。這都和美國大選選情相關。雖然特朗普會試圖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也會結束俄烏衝突，俄羅斯對中國

的依賴會下降但中俄雙邊關係基礎不會改變。更重要的是還消除了中歐關係的一個障礙。特朗普對歐政策一是放棄大西洋主義，二是對歐盟進行貿易戰，三是退出歐洲極為重視的氣候保護議題，四是安全問題。比如不再支持烏克蘭，強迫歐洲增加軍費並以不提供保護作威脅，還一再威脅要退出北約。這都導致歐洲轉向中國。

第四，棄價值觀帶來多重利好效應。價值觀一直是美西方遏制對手的重要手段，這在拜登時代體現得淋漓盡致：不僅利用它凍結中歐投資協定，還以民主的名義組建軍事、經濟和芯片同盟，更是支持台灣的主要藉口。反觀特朗普向來對價值觀毫無興趣，也根本意識不到這張牌對美國在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性。因為一個大國，一定要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意識形態，從而以此號令和影響其國家，能大大減少其影響世界的成本。冷戰時蘇聯靠共產主義，美國則是民主牌。今天特朗普當選本身就是對美西方價值觀最大的否定。因此從話語權和價值體系方面講，美國對中國的攻擊和施加的壓力就大幅減弱了。

削弱「台獨」分裂勢力實力

特朗普棄價值觀還有另一個效果：削

弱了「台獨」分裂勢力的實力。「台獨」分裂勢力自恃有三大資本：一是所謂的「民主牌」；二是「美國牌」；三是經濟發展。這三大資本憑空就少了一個，還有經濟在日益失去大陸市場的同時也會受到美國的壓力。

此外，雖然拜登和特朗普都視台灣為棋子，但在雙方的地位非常懸殊。拜登是從中美博弈、捍衛美國霸主的高度來看待台灣，有很高的戰略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拜登多次「失言」要軍事保護台灣。但特朗普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台灣的：賣更多的武器、台灣交更多的保護費以及和中國大陸經濟戰計價還價的籌碼。比如他回答媒體提問時說大陸如果武統，他就加200%的關稅，台海問題變成了關稅問題。

當然，特朗普選舉期間聲稱計劃對中國產品加徵60%的關稅。且不说美國的物價是否能夠承受，但僅就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至今7年來看，贏家仍然是中國：與貿易戰前的2017年相比，中國出口增長了60%，在全球的貿易份額也增長了2個百分點。

顯然特朗普的當選對於中國而言固然是挑戰，但更是難得的機遇。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